

文献保护 专刊

Document Protection Issue

主办：国家图书馆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图书馆报
2019年5月24日
第2期

10 人物访谈

贺定安：以读者为中心
做好古籍的传承与推广

12 图书推荐

捐赠国图的
日本永青文库汉籍

14-15 镇馆之宝

南京图书馆宋刻本《医说》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特色文献

11 特别策划

韩超：让古籍“起死回生”
沈秋燕：引领公众领略古籍之美

13 业界动态

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
文献整理项目专家评审会召开

16 业务探讨

谈谈古籍中影刻本
与影抄本的制作方法



以读者为中心做好古籍的传承与推广

访湖北省图书馆党委书记贺定安

□本报记者 白玉静

“让古籍中的文字活起来”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积极建立特色古籍馆藏,用丰富的活动让读者走近古籍,是图书界目前的通用做法。湖北省图书馆作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在数十年探索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古籍藏用之道。本报记者近日就古籍整理与保护这一话题,采访了湖北省图书馆党委书记贺定安,请他分享了湖北省图书馆在“让古籍中的文字活起来”过程中的可资借鉴的经验。

记者:新形势下做好古籍传承推广工作的机遇有哪些?

贺定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古籍传承推广工作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一是新时代迎来古籍传承推广的政策机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物古籍的保护传承推广工作,强调“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文化部印发了《“十三五”时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规划》,为古籍传承推广工作营造了良好的政策机遇。

二是法律保障使古籍传承推广环境持续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文物保护法》《公共图书馆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等法律的颁布,为古籍传承推广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三是全社会都在树立文化自信,传承中华优秀文脉。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当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

中,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古籍传承推广是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是专业教育的不断提升,使古籍保护、修复设备更加先进,如古籍书库的恒温恒湿设备,杀虫、防霉、防火、防水、防酸、脱酸以及古籍修复等设施、设备性能全面提升,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新媒体等,为古籍传承推广工作提供了更广阔的服务平台。

记者:近年来,湖北省馆在古籍整理与保护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

贺定安:我们的做法和经验是以读者为中心,打造丰富多彩的活动,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是加强古籍特色馆建设,创新拓展服务空间。建立了“徐行可纪念馆”,以纪念向本馆捐赠10万余册古籍的藏书家徐行可先生,举办徐行可生平事迹及旧藏善本展,展示徐行可生平事迹、与著名学者的交流,部分旧藏善本影印本,部分印章等。建成湖北省典籍博物馆,分设为展览区、阅览区、体验区。举办“荆楚宝典——湖北省图书馆馆藏珍贵古籍展”,展出古籍60部,包括宋写本1部、元刻本3部、明版书31部、清版书17部、稿本和钞本各4部,其中13部古籍配合辅助展览,这是省图书馆规模最大的馆藏珍品展览,宋版写本《华严经》也在展示之列。

二是连续10年举办湖北晒谱节。由湖北省图书馆、湖北省古籍保护中心、湖北家谱收藏中心举办大型公益阅读活动,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优良家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是整理编纂《荆楚文库·方志编》,加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近年来,湖北省图书馆参与了湖北省最大规模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出版工程《荆楚文库》,负责整理编纂《荆楚文库·方志编》,现已整理395种湖北旧方志底本用以影印出版,并为每种方志撰写了影印前言。近年来,仿真影印出版了《方元长印谱》《南宋四家律选》《董蒙训佚文》等善本;编纂出版了《湖北官书局版刻图录》《湖北省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现存湖北著作总录》《湖北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湖北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徐行可旧藏善本图录》《崇文书局版刻丛书》等文献。

四是加强古籍缩微、数字化建设,建立古籍数据库。目前省图书馆馆藏珍贵古籍1106种,计1519盘;扫描古籍650种,计22.9万余余页。建立了古籍数据库,目前《宣统]湖北通志》已经面向读者开放使用,《湖北省图书馆家谱全文数据库》和《湖北省图书馆古籍全文数据库》正在建设之中,年内有望上线供读者网上阅览。

五是建立健全湖北省古籍保护组织机构。2016年成立湖北省古籍保护协会,这是全国第一家省级古籍保护协会。2017年成立湖北家谱收藏中心,专门负责收

贺定安:近几年在古籍整理与保护方面,湖北省图书馆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开展中华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务行动,完成全省古籍普查工作。省图书馆古籍编目人员到博物馆、高校图书馆、市县级公共图书馆等古籍收藏单位进行古籍编目,登记普查数据。连续两年开展中华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务行动,湖北行活动。目前,我省在全国普查平台著录古籍数据7.7万余条,除少数博物馆还需普查外,全省古籍普查基本完成。

二是建立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开展古籍修复。2015年建立了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湖北传习所,聘请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古籍修复专家作导师,开展古籍修复专业培训。省图书馆现有古籍修复人员7人,年修复古籍可达4万余叶。全省有4家古籍收藏单位从事古籍修复,从业人员17名,年修复古籍5万余叶。

三是整理编纂《荆楚文库·方志编》,加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近年来,湖北省图书馆参与了湖北省最大规模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出版工程《荆楚文库》,负责整理编纂《荆楚文库·方志编》,现已整理395种湖北旧方志底本用以影印出版,并为每种方志撰写了影印前言。近年来,仿真影印出版了《方元长印谱》《南宋四家律选》《董蒙训佚文》等善本;编纂出版了《湖北官书局版刻图录》《湖北省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现存湖北著作总录》《湖北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湖北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徐行可旧藏善本图录》《崇文书局版刻丛书》等文献。

四是加强古籍缩微、数字化建设,建立古籍数据库。目前省图书馆馆藏珍贵古籍1106种,计1519盘;扫描古籍650种,计22.9万余余页。建立了古籍数据库,目前《宣统]湖北通志》已经面向读者开放使用,《湖北省图书馆家谱全文数据库》和《湖北省图书馆古籍全文数据库》正在建设之中,年内有望上线供读者网上阅览。

五是建立健全湖北省古籍保护组织机构。2016年成立湖北省古籍保护协会,这是全国第一家省级古籍保护协会。2017年成立湖北家谱收藏中心,专门负责收

集、整理、研究湖北地区家谱文献,是湖北省目前收藏家谱文献最多、保存条件最好的公共文化事业机构,目前收藏家谱2600种,且每年新增200余种。

六是加大古籍善本的采集力度,从海外访求一批珍贵古籍。接受台湾学者范延中捐赠其父范熙壬旧藏善本两种——《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明初闵建刻本)、《周易经传》(明嘉靖建宁府书坊刻本),从日本购回来版写本《华严经》。

七是举办古籍修复技艺展示与展览。联合武汉大学图书馆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开展“古籍修复技艺进校园”活动,举办真人图书馆与读者互动,与高校同行交流,展示古籍修复、传拓技艺等。依托“长江讲坛”这一文化品牌,举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讲座30余场。



记者:如何让让更多人了解古籍、阅读古籍、保护古籍?请谈谈湖北省馆的古籍推广策略和经验。

贺定安:我们的做法和经验是以读者为中心,打造丰富多彩的活动,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是加强古籍特色馆建设,创新拓展服务空间。建立了“徐行可纪念馆”,以纪念向本馆捐赠10万余册古籍的藏书家徐行可先生,举办徐行可生平事迹及旧藏善本展,展示徐行可生平事迹、与著名学者的交流,部分旧藏善本影印本,部分印章等。建成湖北省典籍博物馆,分设为展览区、阅览区、体验区。举办“荆楚宝典——湖北省图书馆馆藏珍贵古籍展”,展出古籍60部,包括宋写本1部、元刻本3部、明版书31部、清版书17部、稿本和钞本各4部,其中13部古籍配合辅助展览,这是省图书馆规模最大的馆藏珍品展览,宋版写本《华严经》也在展示之列。

二是连续10年举办湖北晒谱节。由湖北省图书馆、湖北省古籍保护中心、湖北家谱收藏中心举办大型公益阅读活动,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优良家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是整理编纂《荆楚文库·方志编》,加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近年来,湖北省图书馆参与了湖北省最大规模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出版工程《荆楚文库》,负责整理编纂《荆楚文库·方志编》,现已整理395种湖北旧方志底本用以影印出版,并为每种方志撰写了影印前言。近年来,仿真影印出版了《方元长印谱》《南宋四家律选》《董蒙训佚文》等善本;编纂出版了《湖北官书局版刻图录》《湖北省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现存湖北著作总录》《湖北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湖北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徐行可旧藏善本图录》《崇文书局版刻丛书》等文献。

四是加强古籍缩微、数字化建设,建立古籍数据库。目前省图书馆馆藏珍贵古籍1106种,计1519盘;扫描古籍650种,计22.9万余余页。建立了古籍数据库,目前《宣统]湖北通志》已经面向读者开放使用,《湖北省图书馆家谱全文数据库》和《湖北省图书馆古籍全文数据库》正在建设之中,年内有望上线供读者网上阅览。

五是建立健全湖北省古籍保护组织机构。2016年成立湖北省古籍保护协会,这是全国第一家省级古籍保护协会。2017年成立湖北家谱收藏中心,专门负责收

集、整理、研究湖北地区家谱文献,是湖北省目前收藏家谱文献最多、保存条件最好的公共文化事业机构,目前收藏家谱2600种,且每年新增200余种。

六是加大古籍善本的采集力度,从海外访求一批珍贵古籍。接受台湾学者范延中捐赠其父范熙壬旧藏善本两种——《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明初闵建刻本)、《周易经传》(明嘉靖建宁府书坊刻本),从日本购回来版写本《华严经》。

七是举办古籍修复技艺展示与展览。联合武汉大学图书馆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开展“古籍修复技艺进校园”活动,举办真人图书馆与读者互动,与高校同行交流,展示古籍修复、传拓技艺等。依托“长江讲坛”这一文化品牌,举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讲座30余场。

记者:古籍推广如何向新媒体借力?

贺定安:我们在网站、微博、微信上开辟古籍推广专栏,持续推送古籍保护相关知识,推介珍贵古籍,并与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合作,通过其“两微一端”开展古籍推广活动,讲述古籍故事,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记者:现阶段古籍推广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哪些?做好这一工作的有效路径是什么?

贺定安:现阶段古籍推广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古籍保护和修复的专家较为缺乏,高层次人才亟待培养;古籍保护的公众教育需要重视和提升;古籍推广的方式方法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做好这一工作的有效路径,一是争取各级领导的重视,加大古籍保护、传承推广经费的投入,尤其是基层古籍收藏单位的经费投入;二是构建古籍人才培养机制,大力加强古籍高级人才培养;三是加强用户教育,以特色古籍推广创意活动,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古籍、重视古籍、走近古籍。

让古籍“起死回生”

□韩超 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强调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传播,民间也兴起了传统文化学习的热潮,我们只要看看《国家宝藏》《诗词大会》之类文化节目的火热程度就知道。在新的形势下,我想最大的机遇就是大众对于传统文化的热情高了,传统文化似乎变得“有市场”了,至少从现象上来看传统文化似乎“火”了。

在新时代,传统文化领域的工作者如何向大众传播好传统文化,用怎样的方式让大众更易接受传统文化,成为一个重要课题。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就是传统典籍,也就是常说的“古籍”。但一谈到古籍,大众就会觉得这是学者研究的东西,一般人看不懂甚至很难接触到。所以,新形势下大众对于传统文化的“热”与古籍传播的“冷”就形成了矛盾,这种矛盾其实也是一种机遇。正因为大众了解少,我们古籍工作者就有更多的工作可以做,有更多的空白可以填补。

习总书记提出“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是很好的倡议,也是现阶段古籍整理与保护的重要指导方向。何谓“活起来”,是说它们不是“死”的,是为人所利用的,是跟我们的生活有实实在在的联系的。要做到这些,我认为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起死回生”。

首先是“起死”。古籍堆放在库房中没有人翻阅,没有人去发现,虽然对于古籍的保护有一定的作用,但这就相当于让原本活生生的“书籍”,在某种程度上硬生生变成了“废纸”。古籍工作者要去“起死”,把这些在库房中的古籍整理出来,为他们编目、撰写书志、出版图录等等,尽可能地让古籍展示给大众,让大众了解我们的“家底”。古籍有了自己的“身份证”,才能活过来。南京图书馆作为江苏省省馆,一直致力于古籍的普查与整理,如今已完成江苏省内97%以上的古籍普查登记,古籍都有了唯一自己的编号。这就是“起死”,先让古籍自己的面目清晰起来。

其次就是“回生”。如何让这些古籍在新时代焕发新的价值,让它们再次变成原本应有的“书”的价值,这就是“回生”。这项工作并不好做,毕竟古籍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它的形式、文字、内容都与我们有了一定的距离。但作为古籍工作者,这是不可避免的任务,只有“回生”,古籍才能真的“活起来”,近年来我们也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对于大多数的研究者来说,古籍知识比较丰富,但可能很少见过真的古籍,一般使用的都是影印本、电子扫描件。南京图书馆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研究者和大众提供古籍阅览服务,读者可以实实在在地将古籍捧在手上阅读。试想一下,那本当年戴震、钱大昕、王念孙等大批学者阅读过的书籍,如今在你的手

中,这种阅读体验和感受是其他阅读媒介无法取代的。当然,为了保护古籍,尤其是特别珍贵的古籍,或是已经出版的古籍,我们还是尽量不提供原本。这种遗憾是必需的,否则在公共图书馆的这种阅读量下,我们的子孙可能在某一天将无法看到古籍。为了弥补这种遗憾,我们会采用古籍展览的形式向研究者和大众展示古籍原本。虽然隔着玻璃有隔靴搔痒之感,但毕竟也是“止痒”的。比如今年我们就举办了“家国书运——八千卷楼藏书特展”,吸引了很多读者参观,反响很好。通过这样的形式,我们不仅向读者传播了古籍的知识,也让读者切实看到了古籍原本,更向大众传达了古籍保护的理念。

古籍除了是书籍,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文物。相比瓷器、家具、摆件等文物,古籍这种文物更加娇气,需要更多的保护。除了这些,南京图书馆还定期举办古籍讲座、参观古籍修复等活动,尤其针对青少年。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从小种下古籍的种子,未来在他们身上会结出最甜的果实;同时,我们也借助新媒体的力量,在更大范围内宣传我们的古籍,媒体在很大意义上是空间和时间的延展。我们也试图考虑交互式的运作方式,如何让古籍传播与大众形成良性的互动,是我们对利用新媒体进行古籍推广的新思考。

古籍的传承、保护、推广是一个长期过程,在现阶段我们没有看到很大的成效,也不能着急,这不是一场速战速决的比赛,而是一场漫长的文化之旅。古籍工作人员结构的单一性,古籍人才培养的紧缺性,古籍知识传播的垂直性,古籍与生活的脱节性……这些都是古籍推广还需要面临的问题。目前,我们似乎还不能找到一条有效的路径,这需要长期的教育才能实现。我想,只有当大家不再好奇古籍是什么,把阅读古籍当作生活中一种有益的熏陶,把保护古籍当作文化传承的自责任感的时候,我们的路径可能就在那里了。



2018年12月,《浙江省民国时期传统装帧书籍普查登记目录》全部面世,嘉兴市图书馆的古籍普查登记与成果出版工作宣告结束,从2009年开启的近10年普查历程到达终点。

嘉兴市从“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以来,投入大量财政资金用于古籍保护,为彻底改善古籍特藏库房的硬件设施,立项建造图书馆二期工程(古籍善本特藏楼),设立恒温恒湿库房。目前二期工程主体建筑已完工,进入内部装修阶段,不久将投入使用。另外一项大手笔的投入是《乾隆大藏经》的补阙。馆藏《乾隆大藏经》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但此本非全本,申报时存5373册,普查时经反复清点核查,实存5604册,因有些树叶破损相当严重几乎不可翻阅,故也列入补印之列,最后定下来需补印1730册。2015年市财政拨专款180万元,以故宫博物院藏原雕版补印,遂成完整。

2014年,本馆编纂出版的《嘉兴市珍贵古籍图录》,是第一部集全省市公藏单位珍贵古籍的图录,检索与观赏价值同具;2016年,出版《光绪嘉兴府志》缩版影印本。此二书较实用,是文史研究者的工具书。本馆在2014年还尝试采用雕版印刷术出版了宋代张尧同咏嘉兴风物的《嘉禾百咏》,并修补清宣统二年(1910)嘉兴沈氏刻的《陵阳先生诗》的版片刷印成书,有力地宣传了地方文化。

普查工作让我们摸清了家底。但是一馆之力毕竟有限,所以我们的思路是参与到古籍整理出版项目中。古籍的数字化被认为了解决藏与阅矛盾的有效方法,从2013年起数字化工作未有间断,已经完成50万拍左右,善本基本已经数字化。不过从查阅者的反映看,年轻的读者“阅屏”比较吃力,而且也不能像纸质书那样随意来回翻,更不能两页比对,所以认可度并不高,甚至引起过争议。如何提高古籍阅读的舒适度与效率,也是企业应该纳入考虑范围的。

为了让高冷的古籍接地气,我们向公众推出“让蕴藏在古籍里的技艺‘活’起来”系列体验活动,把与古籍生产与保护相关的技艺整合成一个项目。2015年开始尝试举办,初期仅有雕版印刷、线装书制作两项,逐步增加石刻传拓、活字印刷、修复实践三项,2018年入选年度嘉兴市公共文化服务重点创新项目。我们开展的活动之所以取得较好的效果,有以下几点做法:

第一,改进活动举办方式。活动的实施方式采取“走出去”与“引进来”两种。“走出去”即送活动到学校、到乡镇、与分馆联动,活动以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体验为主。“引进来”是以本馆为场地的阵地服务,通过文化有约、微信平台发布,活动形式主要是石刻传拓、线装书制作、活字印刷的拆装印全套、古籍修复培训。

第二,定位重点活动受众。在活动受众定位上,以面向乡镇、村和社区为主,兼顾城区。这样的定位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城市少儿可参与的类似活动多,参与热情反而低;乡村少儿数量多,类似的活动较少,好奇心强,参与热情更高。二是嘉兴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已经具有成熟的上下联动机制,借助于这一体系,送活动下乡比较顺利。

第三,我们的目的是以活动为媒介宣传古籍,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所以在活动前讲解上一段小知识,做成PPT,比如什么是古籍,古籍有哪些主要的装帧形式,今天体验的技艺有哪些特点,手工纸是怎么制造的,等等。对于来馆参观的低幼儿童,我们采用他们能理解的语言讲解,还给他们展示装具华丽的仿制品。

第四,融入地方文化元素。举办活动所用的雕版、石刻、活字板多取自南湖八景石刻,而“南湖八景”不仅是古代嘉兴的胜迹,更是今日嘉兴的一张文化名片。例如,为配合王店镇举办的“朱舜尊文化艺术节”,我们从《鸳鸯湖棹歌》里选了两首诗,订制成活字版,在王店分馆开展活动,将当地名人、地方文化、传统技艺三者结合,受到百姓的欢迎及当地政府的重视。

第五,充分利用网络新平台。能够提供现场体验的名额毕竟有限,尤其是石刻传拓和古籍修复。而很多人对传统技艺满怀好奇,却囿于诸多条件不能到馆参加。为了扩大受众面,我们开了两场直播,展示雕版印刷和石刻传拓技艺。利用新平台做好宣传推广工作,提高活动影响力,吸引更多的人投入到传统技艺推广中去。

第六,培养活动推广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为嘉善图书馆、平湖图书馆及乡镇分馆的同仁们提供雕版印刷技艺培训,并配备雕版印刷工具,以便他们独立开展活动。这样既解决了人员不足矛盾,又可在全市形成“遍地开花”的局面。

总之,古籍的活动有内涵、有趣味,让大家在动手中感受古书之美,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

引领公众领略古籍之美

□沈秋燕 嘉兴市图书馆地方文化和古籍保护中心

2018年12月,《浙江省民国时期传统装帧书籍普查登记目录》全部面世,嘉兴市图书馆的古籍普查登记与成果出版工作宣告结束,从2009年开启的近10年普查历程到达终点。

嘉兴市从“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以来,投入大量财政资金用于古籍保护,为彻底改善古籍特藏库房的硬件设施,立项建造图书馆二期工程(古籍善本特藏楼),设立恒温恒湿库房。目前二期工程主体建筑已完工,进入内部装修阶段,不久将投入使用。另外一项大手笔的投入是《乾隆大藏经》的补阙。馆藏《乾隆大藏经》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但此本非全本,申报时存5373册,普查时经反复清点核查,实存5604册,因有些树叶破损相当严重几乎不可翻阅,故也列入补印之列,最后定下来需补印1730册。2015年市财政拨专款180万元,以故宫博物院藏原雕版补印,遂成完整。

2014年,本馆编纂出版的《嘉兴市珍贵古籍图录》,是第一部集全省市公藏单位珍贵古籍的图录,检索与观赏价值同具;2016年,出版《光绪嘉兴府志》缩版影印本。此二书较实用,是文史研究者的工具书。本馆在2014年还尝试采用雕版印刷术出版了宋代张尧同咏嘉兴风物的《嘉禾百咏》,并修补清宣统二年(1910)嘉兴沈氏刻的《陵阳先生诗》的版片刷印成书,有力地宣传了地方文化。

普查工作让我们摸清了家底。但是一馆之力毕竟有限,所以我们的思路是参与到古籍整理出版项目中。古籍的数字化被认为了解决藏与阅矛盾的有效方法,从2013年起数字化工作未有间断,已经完成50万拍左右,善本基本已经数字化。不过从查阅者的反映看,年轻的读者“阅屏”比较吃力,而且也不能像纸质书那样随意来回翻,更不能两页比对,所以认可度并不高,甚至引起过争议。如何提高古籍阅读的舒适度与效率,也是企业应该纳入考虑范围的。

为了让高冷的古籍接地气,我们向公众推出“让蕴藏在古籍里的技艺‘活’起来”系列体验活动,把与古籍生产与保护相关的技艺整合成一个项目。2015年开始尝试举办,初期仅有雕版印刷、线装书制作两项,逐步增加石刻传拓、活字印刷、修复实践三项,2018年入选年度嘉兴市公共文化服务重点创新项目。我们开展的活动之所以取得较好的效果,有以下几点做法:

第一,改进活动举办方式。活动的实施方式采取“走出去”与“引进来”两种。“走出去”即送活动到学校、到乡镇、与分馆联动,活动以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体验为主。“引进来”是以本馆为场地的阵地服务,通过文化有约、微信平台发布,活动形式主要是石刻传拓、线装书制作、活字印刷的拆装印全套、古籍修复培训。

第二,定位重点活动受众。在活动受众定位上,以面向乡镇、村和社区为主,兼顾城区。这样的定位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城市少儿可参与的类似活动多,参与热情反而低;乡村少儿数量多,类似的活动较少,好奇心强,参与热情更高。二是嘉兴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已经具有成熟的上下联动机制,借助于这一体系,送活动下乡比较顺利。

第三,我们的目的是以活动为媒介宣传古籍,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所以在活动前讲解上一段小知识,做成PPT,比如什么是古籍,古籍有哪些主要的装帧形式,今天体验的技艺有哪些特点,手工纸是怎么制造的,等等。对于来馆参观的低幼儿童,我们采用他们能理解的语言讲解,还给他们展示装具华丽的仿制品。

第四,融入地方文化元素。举办活动所用的雕版、石刻、活字板多取自南湖八景石刻,而“南湖八景”不仅是古代嘉兴的胜迹,更是今日嘉兴的一张文化名片。例如,为配合王店镇举办的“朱舜尊文化艺术节”,我们从《鸳鸯湖棹歌》里选了两首诗,订制成活字版,在王店分馆开展活动,将当地名人、地方文化、传统技艺三者结合,受到百姓的欢迎及当地政府的重视。

第五,充分利用网络新平台。能够提供现场体验的名额毕竟有限,尤其是石刻传拓和古籍修复。而很多人对传统技艺满怀好奇,却囿于诸多条件不能到馆参加。为了扩大受众面,我们开了两场直播,展示雕版印刷和石刻传拓技艺。利用新平台做好宣传推广工作,提高活动影响力,吸引更多的人投入到传统技艺推广中去。

第六,培养活动推广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为嘉善图书馆、平湖图书馆及乡镇分馆的同仁们提供雕版印刷技艺培训,并配备雕版印刷工具,以便他们独立开展活动。这样既解决了人员不足矛盾,又可在全市形成“遍地开花”的局面。

总之,古籍的活动有内涵、有趣味,让大家在动手中感受古书之美,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



湖北省典籍博物馆对外开放



湖北省图书馆举办古籍修复培训

书卷为媒 友谊长青

日本永青文库捐赠汉籍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6月26日,日本前首相、日本公益财团法人永青文库理事长细川护熙将36部4175册汉籍无偿捐赠中国国家图书馆,为中国国家图书馆上下一心,全力开动,与海关总署、驻日使馆等机关单位紧密配合,历经数个月的筹备策划,圆满地完成了报关、押运、点交、策展等一系列工作。6月11日,36部4175册汉文汉籍终于在东京成田机场装机、起飞,满载着日本友人对中日世代和平友好的向往与祝福,飞越2400多公里的直线距离,在首都机场安然落地。这不仅是海外中华古籍实体回归的一件大事,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

有感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意义重大,2018年初,已是耄耋之年的日本前首相、永青文库理事长细川护熙主动通过日本外务省向中国使馆表达了捐赠汉籍的美好愿望。这一消息立刻引起了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文化部(现文化和旅游部)即刻指示中国国家图书馆组织古籍版本专家,于2月8日成立代表团赴日考察,就捐赠事宜进行磋商洽谈。

据考察,日本永青文库的36部4175册汉籍是一批重要的古籍资源,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版本价值和文物价值:一、从内容上看,此批汉籍的主体部分属于汉籍当中的要籍。经部如清阮元辑刻的《皇清经解》一千四百零八卷,唐孔颖达《尚书正义》经注疏合刻本;史部如二十四史、《史记评林》《三国志》《资治通鉴》;子部如《群书治要》《佩文韵府》;集部如李善注《文选》;丛书如《四部丛刊》。二、从版本上看,这批要籍的主体部分属于官版或家刻本,即学界普遍认为可靠的文本。三、从完整情况看,保存较为完整,属于洪亮吉《北江诗话》当中的“考订家之藏书”这一派别。

回国之后,考察团将这批汉籍的情况作了详尽汇报。文化和旅游部维树刚部长就此事作出重要批示:同意中国国家图书馆接收日本永青文库捐赠汉籍!并指示中国国家图书馆认真做好此批汉籍的收藏保

管和服务利用工作。

捐赠事宜一经敲定,一系列筹备事宜便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在文化和旅游部的全力支持下,中国国家图书馆上下一心,全力开动,与海关总署、驻日使馆等机关单位紧密配合,历经数个月的筹备策划,圆满地完成了报关、押运、点交、策展等一系列工作。6月11日,36部4175册汉文汉籍终于在东京成田机场装机、起飞,满载着日本友人对中日世代和平友好的向往与祝福,飞越2400多公里的直线距离,在首都机场安然落地。这不仅是海外中华古籍实体回归的一件大事,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

2018年6月26日,日本永青文库汉籍捐赠仪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隆重举行。历经日本细川家族三代珍藏的36部4175册汉籍正式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为使此批汉籍能够得到更好的展示,中国国家图书馆还策划举办了“书卷为媒 友谊长青——日本永青文库捐赠汉籍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展”,以中日两国纵贯千年、源远流长的书籍之路为主线,全方位地展示此批永青文库所捐汉籍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意义。

为做好永青文库捐赠汉籍的保护和利用,凸显此批汉籍捐赠对于中日友谊、中日文化交往和中日典籍交流的示范意义,中国国家图书馆在恒温恒湿的善本书库内设立了永青文库捐赠汉籍专藏,并向读者提供原件阅览服务。同时,为了加强对此批汉籍的再生性保护,促进其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播和利用,中国国家图书馆还启动了此批汉籍的数字化工作,建立永青文库捐赠汉籍专题数据库,秉承边建设边服务的原则,陆续面向全球公众提供免费查阅服务;并选择部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意义的捐赠汉籍影印出版,化身千百,服务社会。

7月26日,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组织专家学者召开了“日本永青文库向中国国家图书馆捐赠汉籍专家

座谈会”,进一步探讨日本永青文库捐赠汉籍的学术价值。据山东大学学院院长、教授杜泽逊先生研究,从版本上看,此批汉籍还具有如下特点:

1.初刻本或较原始的刻本。如王先谦《皇清经解续编》光绪十二至十四年(1886-1888)南菁书院、江苏书局刻本,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光绪三十年虚受堂刻本,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订》光绪二十三年师伏堂刻本等。

2.渊源于古刻善本的版本。如日本弘化四年(1847)熊本藩时习馆刻《尚书正义》,是影刻日本足利学校藏南宋浙东路八行本。日本江户刻《春秋经传集解》,是据日本庆长古活本翻刻,而庆长本出于五山版,五山版出于南宋兴国军学本。光绪十七年江苏书局刻《做唐律疏议》是重刻孙星衍《岱南阁丛书》本,孙本则是影刻元至正余志安勤有堂本。江苏书局本还增加了影宋抄本《音义》一卷附于后。

3.后出转精的精校本或精校本的重刻本。如李鼎祚《周易集解》嘉庆二十三年(1818)木读周氏刻本,出于乾隆卢见曾雅雨堂本,而雅雨堂本是精校本。《经典释文》同治八年(1869)崇文书局刻本出于卢文弼抱经堂刻本,而卢文弼本属于精校本。《说文解字注》民国二十二年(1933)扫叶山房石印本,源于民国三年蕙英馆石印本,经过校勘发现,蕙英馆的本子比段玉裁经韵楼本错字减少许多。《资治通鉴》日本天保七年(1836)津藩有造馆刻本是重刻天启陈仁锡本,比较平常,但是眉上有江户时代日本学者精心校勘的校记。方孝孺《方正学先生逊志斋集》同治十一至十二年宁海知县孙焘刻本,也是一个校勘较好的后出版本。

4.值得重视的日本版本。如日本竹添光鸿的《左氏会笺》,底本是日本最古老的写本,竹添光鸿又校勘了许多旧本,网罗了大量旧注,加以精心选择,加上自己的研究心得,使这部书成为一部版本讲究、校注都具功力的代表性著作。又如



《书卷为媒 友谊长青——日本永青文库捐赠汉籍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特展图录》
作者: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11月
定价:260.00元

《群书治要》,日本天明七年(1787)刻本是这部书的最早的刻本,也是《四部丛刊》的底本。江户刻本《左传》、弘化四年日本熊本藩影刻八行本《尚书正义》也是日本刻本的名品。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中日两国自古以来就是文字相通、文化同源的邻邦。两国之间舟楫往还,在文学、艺术、宗教、技术等诸多方面不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并以汉字为媒介,共同书就了浩如烟海的汉文典籍,创造出中日两国乃至全世界共同的文化遗产与精神瑰宝。谨将此次展览中日两国的珍贵书影集为图录,纪念这一文化交流的不朽盛事,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献礼!

(本文为《书卷为媒 友谊长青——日本永青文库捐赠汉籍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特展图录》前言)

日本永青文库所捐汉籍举要

2018年,日本前首相、日本公益财团法人永青文库理事长细川护熙将36部4175册汉籍无偿捐赠中国国家图书馆。此批汉籍涵盖经、史、子、集、丛五大部类,包括经部14部、史部9部、子部4部、集部5部、丛部4部,内容丰富,品类齐全,保存完整,其中更不乏我国历史上久已失传的重要典籍,如唐魏徵等人所撰《群书治要》,因囿于禁中,流布不广,宋时已亡佚。所幸此书经由日本遣唐使带到日本,成为学习研讨中华文化的一部重要经典,被日本历代天皇及大臣奉为圭臬。平安时代,日本皇室将它作为帝王教育的必修课,形成系统阅读读书的传统。江户时期,《群书治要》从皇室贵族抄阅,逐渐成为学者研究的重要书籍。宽政八年(1796),日本学者近藤守重将三部《群书治要》委托商船带回中国,是书遂为清朝学者所知,

成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仲勋同志还曾为《群书治要考译》一书题词“古镜今鉴”,揭示了此书以史为鉴、警世育人的重要价值。

唐贞观初年,孔颖达等人奉敕撰《尚书》义训百余篇,后为《五经正义》之一。《尚书正义》搜罗宏富,考订详赡,是研究古史的珍贵资料。宋刊八行本《尚书正义》曾在中国失传,日本则存有两部:一部曾藏于大阪私人手中,清光绪年间由杨守敬重金收购;另一部则藏于日本足利学校。日本弘化四年(1847)熊本藩时习馆据足利学校所藏宋本影刻刊行。

此批捐赠汉籍中即有日本弘化四年(1847)影刻宋越州本《影宋本尚书正义二十卷》一部,也彰显了中国典籍海外回归的一段佳话。

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整理项目专家评审会召开

本报讯 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整理项目专家评审会不久前在国家图书馆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马大正、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刚、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汪朝光,原中央党史研究室秘书长黄小同、经济日报副总编李正聚、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长马振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晓秋、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黄兴涛、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宋志勇、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陈力等10位专家参加了评审。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兼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主持会议。

评审会上,国家图书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办公室主任马静介绍了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整理出版项目的整体策划、阶段性成果和各单位申报情况,与会专家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各级图书馆、档案馆、出版社、科研院所等51家单位申报的91个项目逐一进行评审,遴选出符合要求的优秀申报项目,并积极建言献策,对民国时期文献的整理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为带动全国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的保护工作,向社



会公众与学界提供高质量的文献资料,国家图书馆从2013年开始面向全国组织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整理项目申报,依据文献资料类型、濒危状况、珍稀程度和社会需求,有计划、分步骤、成规模地整理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经过数年努力,取得明显成效。截至2018年底,共立项200项,完成95项,出版图书6232册,多项填补了国内空白,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民国时期文献资料丛编”“抗日战争文献史料丛编”“革命历史文献资料丛编”“民国时期档案、日记、手札文献”“民国时期文献目

录、图录、索引”“民国时期小报系列”“‘满铁’对华调查资料丛编”八大系列,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科研单位、社会公众对民国时期文献的需求。

2019年,国家图书馆继续面向全国开展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整理的申报立项工作,在选题上把好意识形态关,在具体实施上采取单位申报、专家评审、项目资助机制。内容涵盖民国时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卫生等各个领域。

评审会结束后,国家图书馆将及时与各申报单位联系反馈评审结果,启动立项相关工作,不断推动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

第十届南图阅读节主读《资治通鉴》

本报讯 不久前,第十届南图阅读节暨江苏“百馆共荐,全省同读”系列活动以及第二期南图阅读台选取了《资治通鉴》这一备受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视的史学名著,以《资治通鉴》:知兴替,明得失》为主题展开。

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张年春,南京图书馆党委书记韩显红,江苏省委统战部五处处长单书安,江苏省法院机关党委副书记陆俊峰等领导出席了系列活动开幕式,南京图书馆副馆长许建业主持。

开幕式上,由南京图书馆向淮安市涟水县成集镇条河村、宿

迁市泗阳县南刘集乡新华村、连云港市灌云县同兴镇梁山村三个省定经济薄弱村帮扶点代表移交《资治通鉴故事》等共3000余册价值约10万元的少儿图书。

“《资治通鉴》:知兴替,明得失”——第十届南图阅读节暨江苏“百馆共荐,全省同读”系列活动之嘉惠论坛随后成功举办。演讲嘉宾有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国刚,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生群,南京图书馆原馆长、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徐小跃。

张国刚教授首先作《资治通鉴:家国兴衰与历史智慧》的主题演讲。张教授以“进经合道”的典故出处为例,阐释了“经”与“道”

的三重维度,指出这是《资治通鉴》的精髓所在。赵生群教授的演讲题目是《资治通鉴与治国理政》。赵教授认为《资治通鉴》注重把握天下大势,所谓“通”,即包含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并论述了德、礼、法的概念以及三者的关系。徐小跃教授发表《〈资治通鉴〉:知兴替,明得失》主旨演讲,指出《资治通鉴》一书兼具史观和史识,通过读书可以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

此外,针对《资治通鉴》,南京图书馆还举办了主题为《资治通鉴》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讲座,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生群主讲。田丰

天津师大古籍保护研究院举行建院周年教学研讨会

本报讯 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建院周年教学研讨会不久前在天津师范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会议由古籍保护研究院管理委员会秘书长顾钢教授主持。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院长高玉葆教授致开幕辞。古籍保护研究院聘请国医大师张大宁教授为顾问,古籍保护领域专家沈津、刘家真、李国庆、柯平、林明、刘海帆、杨文津、汪帆为特聘导师。

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姚伯岳教授做了《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

建院周年工作报告》,报告指出一年来古籍保护研究院不断引进人才,现已初步建立了合理的师资队伍,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人才培养方面,将硕士点研究生专业方向改为“古籍保护与传播”,并调整了专业培养方案;与此同时还在本科生中开设了“古籍与古籍保护”全校通选课。在社会服务方面:古保院完成了国家古保中心委托的《全国古籍保护学科建设规划纲要》研制工作;主办了国家级“新时代的古籍保护研究与新技术应用”高级研修班,承办了“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一届十五次常务理事会议暨一届

五次理事会”,国家古保中心“第四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管理人员研修班”;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指导和校领导及学校各部门支持下,古籍保护研究院已逐步成为国家古籍保护工作重要活动基地和古籍保护高端人才培养中心。

随后,在姚伯岳教授主持的教学研讨会上,新聘顾问和特聘导师围绕古籍保护的学科定位、培养目标、教学方法等关键问题,建言献策,各抒己见。特聘导师、天津图书馆李国庆研究员则作了题为《众志成城铸辉煌——2007-2018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综述》的主题报告。

新闻速递

“西北地方文献问卷调查和书目推广”活动举行

本报讯 甘肃省图书馆学会地方文献专业委员会不久前开展了“春叶戴囊,书卷琳琅——西北地方文献问卷调查和书目推广”主题活动,这也是“陇右寻珍”西北地方文化推广活动在2019年的延续。

活动由两部分组成,其一,“西北地方文献问卷调查”;其二,“西北地方文献书目推荐”。活动中,共发放“西北地方文献问卷调查”100份及“西北地方文献推荐书目”100份。大家争相填写问卷,索取书目。据悉,以问卷的形式调研“西北地方文献”,在甘肃业界还是第一次,目的是通过问卷调查所反映的真实情况,了解社会公众对西北地方文献的认知程度,分析西北地方文献利用率,并提出西北地方文献推广工作的新方法和新策略,以便更好地开展相关工作。

浙江省传统地方戏曲项目展走进湖州市图书馆

本报讯 由浙江图书馆和文化共享工程浙江省分中心主办的“余音绕梁”——浙江省传统地方戏曲项目展,不久前以资源共享的形式来到湖州市图书馆,将在湖州市图书馆展出8天。浙江是中国戏曲的摇篮,中国戏曲的第一缕曙光——南戏,就是在浙江瑞安诞生。浙江也是戏剧大省,戏曲资源丰富,戏曲人才辈出。为更好地传承与发展戏曲事业,经过广大普查工作者的努力,至2015年底,确定浙江省现有昆剧、京剧、越剧、婺剧、绍剧、甬剧、姚剧等56个戏曲非遗项目。本次展览分为中国戏曲基本知识、浙江省传统戏曲发展演变和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传统戏剧项目等三个部分。

图片报道



本报讯 5月15日,“旷世宏编,文献大成——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文献展”作为“亚洲文明联展”附展之一,在国家图书馆展出。展览分为五个单元,共展出因馆藏《永乐大典》原件12册,同时展出其他珍贵善本古籍、舆图、名家手稿,以及不同时期出版的《永乐大典》影印本和海外收藏《永乐大典》影印本等。



本报讯 为展示烟台图书馆所藏精品家谱,为广大读者提供家谱修学学习机会,不久前,烟台图书馆在六楼古籍阅览室举办了烟台图书馆馆藏精品家谱展。这次活动,烟台图书馆展览了馆藏部分清代家谱及近年获赠新修家谱近百部,展示了烟台图书馆家谱数字扫描成果,迎合了当今盛世修谱的社会需求,受到了读者好评。



为庆祝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配合日本永青文库汉籍捐赠仪式,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展览部、古籍馆联合策划举办“书卷为媒 友谊长青——日本永青文库捐赠汉籍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展”,于2018年6月26日在国家典籍博物馆第一展厅隆重开幕。细川护熙先生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参观了本次展览。

南京图书馆藏宋刻本《医说》及其影印 “医话”著作 稀世宝物

□赵彦梅 韩超 (南京图书馆)

南京图书馆藏书主要来自江苏省立国图图书馆、中央图书馆的旧藏,新中国成立后又补充了苏南文管会藏书,以及朱希祖、过云楼等旧藏。现藏古籍160万余册,目前已整理100万余册,含善本10万余册,包括宋元刻本近200部,明刻本近7000部,收藏量仅次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其中,最为珍贵的收藏主要传承自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南京图书馆藏十大珍本中半数以上为丁氏旧藏,《医说》即是其一。

《医说》是宋代名医张杲所撰的一部“医话”著作。其书中所集皆关乎医事,如评述医家人物,记录医方医案,发挥诸家医理等等,内容生动有趣,形式灵活,今人分类例归入医学之综论。《医说》始刻于宋代,然传于今者皆有残缺。民国间,江苏省立国图图书馆据八千卷楼旧藏宋本为底本,以明本配补影印,始有较精之足本广泛传播。

张杲及其《医说》

张杲(约1149—1227),字季明,宋新安(今安徽歙县)人,家世业医,其伯祖张扩,受知于范纯仁,得当时名医庞安时之传,名动京洛间。其祖张挥,为人温醇,亦以医名。其父张彦仁,尤以医术高超名世。张杲即成长于这样的儒医世家,自幼承继家学,而又雅好读书,博览广集,“凡书之有及于医者必记之”,得医学史料、典故,各种见闻与传说,验方秘方等,整理分类,定为十卷。其书初稿成于淳熙十六年(1189),后又历三十五年之增补修订,于嘉定十七年(1224)定稿并刊刻。马端临《文献通考》误“张杲”为“张景”,以后明刊本有沿其误者,亦有不误者。国图图书馆影印此书时,虽诸宋、明人序跋,聊拾微跋文皆不误,而版权标签页上,仍题作“宋新安张景季明撰”,可知一事一字,一旦谬误流传,则纠之也难。

全书十卷四十九门。卷一依次介绍历代名医,上追伏羲,下迄唐代的王冰,共一百六十六位医家。卷二分医书、本草、针灸、神医药四门,下列书目。卷三介绍一些方剂治法和症候,卷四至卷七分列内

外科数十种疾病的疗法和食忌。卷八内容含服饵并药忌、疾证和论医,其实收录内容庞杂,亦有医案、医论和医学文献考证等。卷九主要收养生类和妇产科的内容。卷十收儿科和疮、五绝病、疝瘤等这些常见症疾,最后收录医功报应作为全书之收尾。全书脉络清晰,引用文献皆一一注明出处,非但有利于后人覆考查证,甚至还保存了若干佚书籍的部分内容。其书取材丰富,广收博采,远追神农、黄帝,近取作者经验之方,细大不捐,点滴成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此书和作者如是评价:“取材既富,奇疾险证,颇足以资触发,又古之专门禁方往往在焉。三世之医,渊源有自,固与道听途说者殊矣。”

作为医话类著作,此书虽辑自众典,但整体仍能保持文风通畅,令人读之有味。其中一些经验方,如:其中卷四“鼻衄吐血”题下,教人用山桅子烧灰存性,流鼻血时吹入鼻腔,可以止血。又教人饮白萝卜汁,清凉降火,想来皆有利无害,似可如法施行。而书中谈阴功报应者,亦冀劝人向善,勉励医者常怀仁心行仁术的意味,亦未可一概否定。

南京图书馆藏宋刻本《医说》

《医说》在成书之后即刊刻行世,宋刻今存世有三:一为南图所藏,有旧钞补页,一为北大图书馆所藏,此书曾经郑邦述群碧楼、李盛铎木犀轩所藏,缺卷二、卷七部分。一为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仅存九、十两卷。南京图书馆藏宋刻本《医说》(以下简称“南图本”)

为丁氏八千卷楼旧藏,《善本书室藏书记》卷十六著录,叙述颇详,备录如下:

《医说》十卷,宋刊本,黄芑圃、汪闳源藏书。《经籍访古志》载《医说》第九、第十两卷,宋槧本,左右双边,九行,行十八字。版心下有刻手姓名。卷末载嘉定甲申彭方跋、嘉定甲申李以制跋、开禧丁卯江畴跋、宝庆丁亥徐某跋。此本行款悉合,只存彭、李二跋及江畴跋七行,后皆脱。前存目录,第十叶起至三十叶前亦脱。末有黄芑圃手题,云:“余向观书华阳顾氏,见有残宋本,复借余校本传录一本。去冬,顾氏原本归余。中多缺失,版心有莫辨处。又从香岩借传校本勘之,知余校本多讹,而香岩承之。谨就宋刻存者,一字一句细校,方可谢余前过,而益信书之不可不藏宋本也。此时覆本不多见,故用校本者,乃明刻本。明刻亦有二。向用为校宋者取明刻之善本,然中多谬误,校时不及检点,故承之也。此书钞补之处,皆不可信。万一再有全宋刻出,始可补此残缺。不则,此残宋刻本不已为希世宝物耶?余故乐得而收之,又乐得而装潢之。丙子仲春复翁。”有“迪安堂书画印”“长洲汪士钟”“閩源氏印”“观察使者”“三十五峰国主人所藏”诸印。

丁氏跋文基本将此宋刻本的存缺、行款、收藏源流叙述清楚了,其云《经籍访古志》载者,即今日本宫内厅藏本。然其中亦有可补充及有误者。如黄丕烈手跋为节录,故相关叙述有不清之处。“余向观书华阳顾氏,见有残宋本。复借余校本传录一本。”一句中多未抄,原文为“余向观书华阳顾氏,见有残宋本《医说》,曾借楼

手校一过。彼时周丈香严有覆宋本,复借余校本传录一本。”又“观察使者”当作“观察使章”。另外,此本残缺者尚不止丁氏所言,今核原本,一一述之。卷前罗项序,系抄抄,然亦不全,则所据之本亦是不全之本。卷二第三十叶后脱。卷三第八叶前脱。卷四第三十七叶脱、第三十八叶后脱。卷五第八叶前脱,第四十三叶脱。卷六三十七叶后脱。卷七第一页脱。卷八第三十三叶脱。卷九第七叶前脱。

国图图书馆影印《医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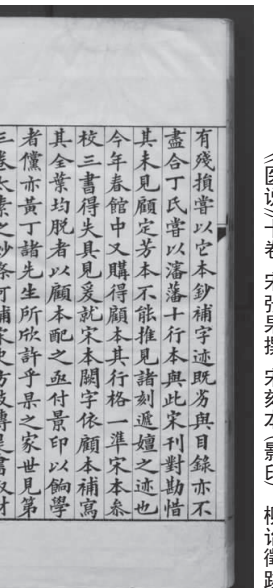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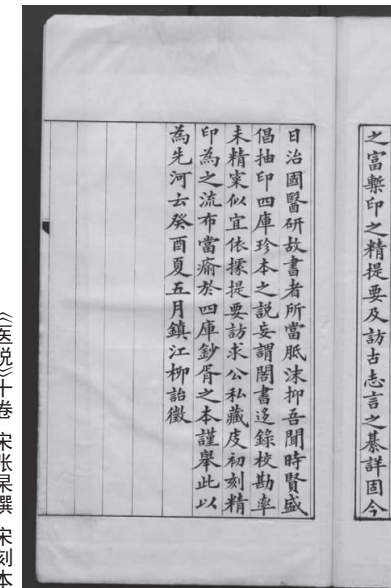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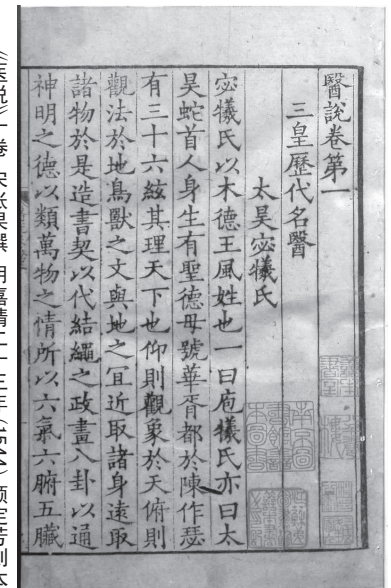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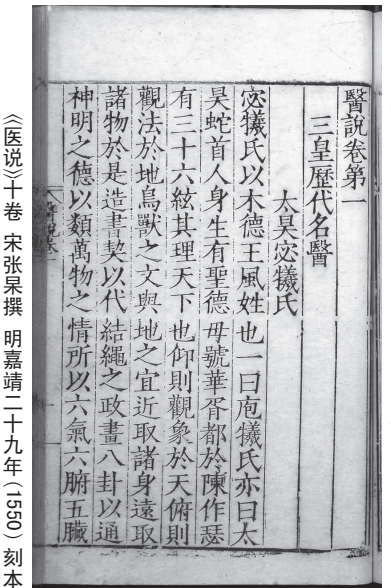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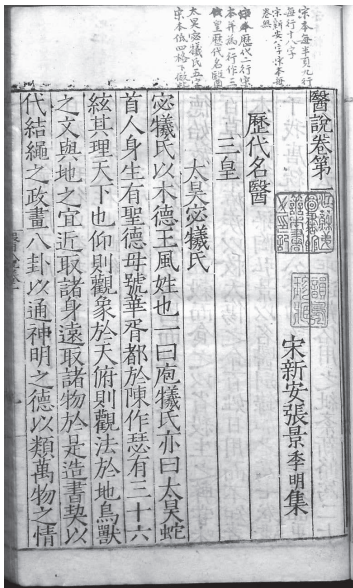
丁氏书归江南图书馆后,馆内同仁积极利用这批藏书,为之编目、整理,并将罕见之书影印出版,《医说》就是其中之一。民国二十二年(1933),江苏省立国图图书馆将宋刻本《医说》影印出版,柳诒徵亲撰跋文。此跋对于了解《医说》流传及影印经过有重要价值,不烦录之。

张杲《医说》十卷,四库著录。自明以来翻刻改订者有嘉靖癸卯邓正初本、嘉靖甲辰顾定芳本、嘉靖丙午冲藩本、万历己酉张直本、朝鲜活字本、翻印本、周恭续编本。其宋刊原本见于著录者只此黄芑圃、汪闳源、丁松生旧藏,今在盩山书库之十卷。及群碧楼

觞之中央研究院之九卷,《经籍访古志》所载九、十两卷,今存日本图书寮者耳。邓正闇得于厂肆者无第二卷,以明刻配补,固不逮丁书之具足十卷。丁书亦有残损,尝以它本补抄,字迹既劣,与目录亦不尽合。丁氏尝以冲藩十行本与此宋本对勘,惜其未见顾定芳本,不能推见诸刻递嬗之迹也。今年春,馆中又购得顾本,其行格一准宋本。参校三书,得失具见。爰就宋本阙字依顾本补写,其全页均脱者,以顾本配之,亟付影印,以饷学者,犹幸黄、丁诸先生所欣许乎?杲之家世见第三卷“太素之妙”条,可补《宋史方伎传》。是书取材之富、架印之精,《提要》及《访古志》言之甚详,因今日治国医、研读书者所当脉脉。抑吾闻时贤盛倡抽印四库珍本之说,要谓阅书选录校勘率未精案,似宜依据《提要》访求公私藏度初刻精印为之流布,当痛于四库钞胥之本。谨举此以为先河云。癸酉夏五月镇江柳诒徵。

据柳诒徵,知影印本以顾定芳刻本补足宋刻本残叶,然馆藏顾本实亦未为全本,其缺者仍用旧抄。计国图图书馆补抄者为:罗项序,目录第四至十一叶、卷二之末、卷三之首、卷四之末、卷五之首、卷六之末、卷七之首、卷八之末、卷九之首、宋人跋文。其未能补者,目录一至三,此影印本用顾刊本配叶时还对行格作细微修改。经此一番补足,此影印本洵为完善,传播至广。

今日的影印及版本获取条件已经远较柳诒徵时便,若其后影印《医说》,可参互今存三宋本以补足,或可聊慰黄氏“万一再有全宋刻出,始可补此残缺”之憾。



《医说》十卷 宋张杲撰 明嘉靖二十三年(1552) 顾定芳刻本

《医说》十卷 宋张杲撰 明嘉靖二十三年(1552) 顾定芳刻本

《医说》十卷 宋张杲撰 明嘉靖二十三年(1552) 顾定芳刻本

《医说》十卷 宋张杲撰 明嘉靖二十三年(1552) 顾定芳刻本

《医说》十卷 宋张杲撰 明嘉靖二十三年(1552) 顾定芳刻本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之馆藏精粹 特色文献 弥足珍贵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是广东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省级公共图书馆,1912年创办于清末广雅书局藏书楼旧址。历经一百多年积累,目前该馆拥有文献800多万册,其中以古籍和地方文献为特色的文献约100万册,是为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之馆藏精粹,堪称镇馆之宝,包括古籍善本、广东方志、族谱、舆图、旧报刊、名家稿本、粤人著述、孙中山和辛亥革命文献、南海诸岛史料、港澳文献等等。

精粹举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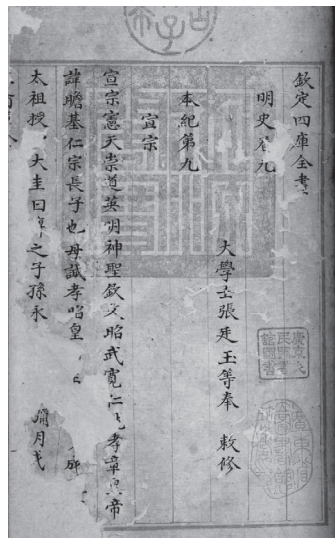
临川先生文集一百卷 目录二卷(宋)王安石撰 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两浙西路转运司王玘刻,元明递修本。此本原为徐乾学旧藏,20世纪50年代初采访得到,现为广东省仅存两部宋本之一。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 (后秦)释鸠摩罗什译 金元间刻本。经折装,纸张为北方染黄纸,多麻纤维成分,字体方正,多简体异体字,北地民间风格浓厚。扉面构图复杂,铺陈华丽,线条流畅。此本约成于公元十三世纪北方晋南地区,具有独特史料价值。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新刊素问入式运气论奥三卷 (宋)刘温舒撰 黄帝内经素问遗篇一卷 元后至元五年(1339)胡氏古林书堂刻本。为《中华再造善本》之底本,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韵谱二卷 (明)朱睦㮮撰 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白波刻本。此本流传甚稀,刻印精美,品相完好,为海内外孤本。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明史三百三十六卷 (明)张廷玉撰 清乾隆文源阁《四库全书》零本。此本为清修《明史》定本之前的一个修改底本,为不可多得的“文源阁本”。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明史

唐大诏令集一百三十卷 (宋)宋敏求辑 明抄本。此本为该书现存卷帙最齐全的一部钞本,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正在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嘉靖】广东通志七十卷 (明)黄佐修 明嘉靖刻本。此本为现存明代第二部广东地方总志,版本稀少,品相最佳。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桂轩稿十卷 (明)江源撰 明弘治四年(1491)刻本。此书于明代行世已稀,为国内仅存之本。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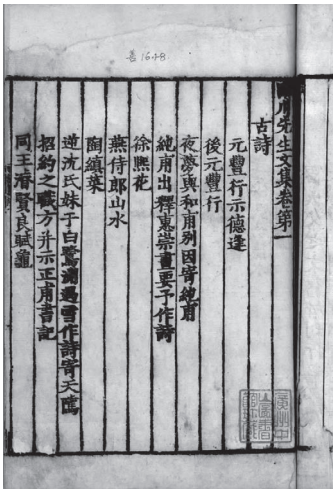
大方广佛华严经疏演义钞六十三卷 (唐)释澄观撰 明嘉靖杭州刻本。清钱谦益、柳如是朱墨笔圈点批校。此本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学思稿不分卷 (清)陈澧撰 稿本。陈澧(1810—1882),字兰甫,号东塾,广东番禺人,清代著名学者。此本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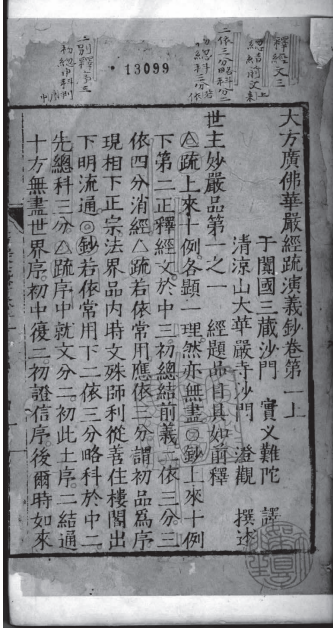
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十一卷 发凡一卷 康有为撰 光绪二十七年(1901)稿本。

孙中山致区凤墀信 孙中山撰 1896年11月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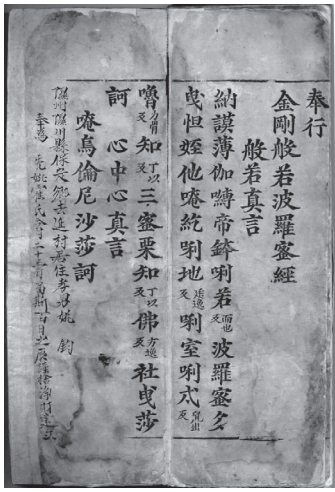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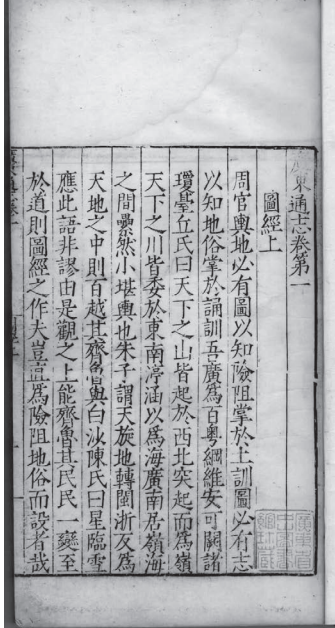
临川先生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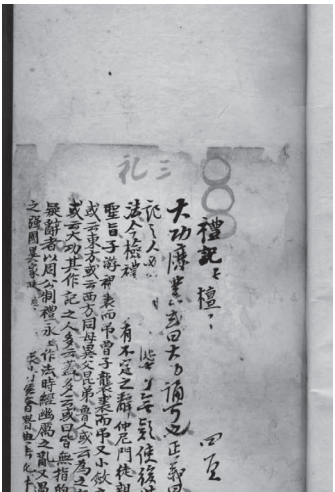
大方广佛华严经疏演义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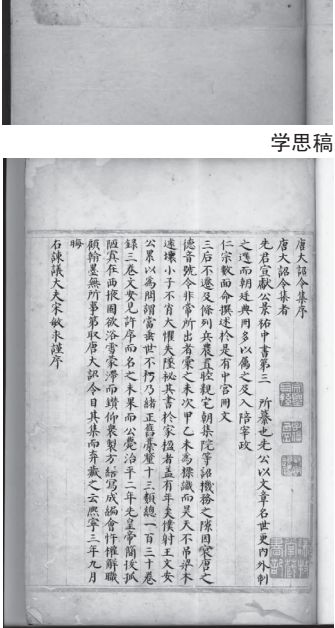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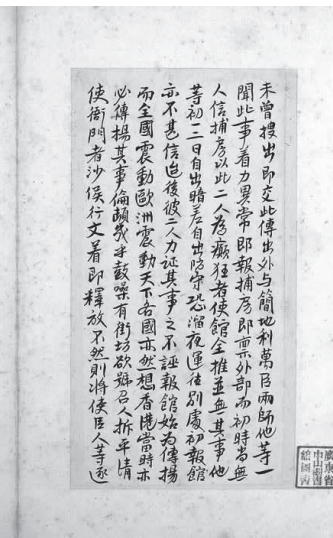
【嘉靖】广东通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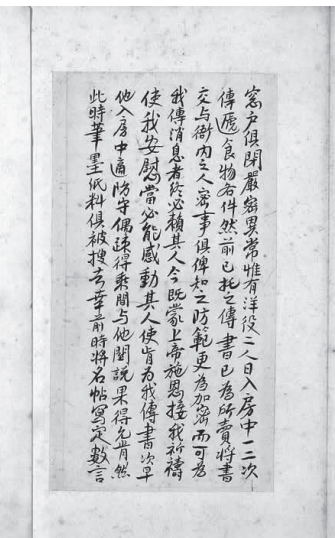
学思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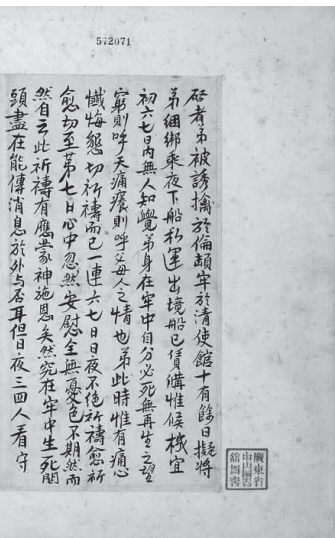
唐大诏令集



孙中山致区凤墀信



孙中山致区凤墀信



孙中山致区凤墀信

谈谈古籍中影刻本与影抄本的制作方法

□徐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原总编辑)

影刻本和影抄本是中国古籍中非常重要的两种版本,其中尤以影宋刻本和抄本名气最大,数量最多。它们是如何制作的?以往论者大多人云亦云,陷于“覆纸摹写”的误区。经认真观察比较,并参考相关论述文章,笔者有了一些新的发现与想法发表在这里。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影刻本

以往论者大多认为:影刻本,是用一薄纸覆于某底本书叶之上,影摹其图文及版式,再行雕刻木版,经敷墨覆纸刷印而成。此定义似有以偏概全之嫌。首先,清后期不少影刻古籍采用了照相技术,印出纸样直接覆版雕刻。例如《古逸丛书》之《玉篇》(图1),原本为日人柏木探古藏,相传为唐宋间物,柏木秘惜殊甚。承柏木提供照相本,始得刊入《古逸丛书》。当时日本以照相法复制翻印古籍盛行,技艺精湛,《古逸丛书》成书快质量高,当普遍采用照相法,绝不止一部《玉篇》。照相法影刻古籍不仅仿真度好,效率也比手工摹写高得多。

其次,用“底本覆纸影摹”的方式也许存在,但数量不会多。因为明清时期的宋版书已成稀罕之物,用薄纸直接覆在书叶上描摹,极易透墨污染底本。而且线装书不易铺平固定纸张,遇订口较紧的书更难操作。为此,多数情况下会采用非接触式的摹写法复制原书,如“对临法”。华蕾《古倪园本〈梅花喜神谱〉刊印考》一文说:“袁廷枬在转模宋本的过程中使用了不同的手法:梅瓣与枝干部分用的应该是双钩法,因此连飞白都与宋本无异。花蕊用的是对临,所以有时连数量都有出入”(《图书馆杂志》2010年第6期)。所谓对临法,就是非接触描摹法。其实梅干与枝干部分也未必不是用的“对临法”;花蕊与宋刻出入大也未必由“对临法”所致(图2)。在影宋刻本中恣意改动文字甚至行款的现象并非个例。如《古逸丛书》影刻古籍时,就曾对其中《庄子注疏》《广韵》等进行篡改(见《日本访书记》卷七、《文禄堂访书记》卷一元刻本《广韵》杨守敬跋)。张元济在宣传《四部丛刊》忠实于原作时说:“近代影刻日本,如黄丕烈《士礼居丛书》改小原书(重刻明嘉靖本《周礼》),黎庶昌《古逸丛书》移动行款(《杜工部草堂诗笺》),兹编力矫斯弊,识者鉴之《四部丛刊例言》”。黄丕烈影刻明本《周礼》将原书尺寸缩小,在照相技术出现前,只能采用非接触式方法,获得等比例缩小的刻版。

那么非接触式描摹,如何保证影刻之书的行款尺寸和字形与原刻大体一致呢?《刊印考》以为:“格纸抄书早已蔚然成风,而袁氏贞节堂也印制过数种不同的套格纸抄不同的书。笔者猜想,影模《梅花喜神谱》时袁廷枬可能也是先制作了套格纸,然后才着手临摹、花和版心、鱼尾。”此话非常合理,“套格纸”临摹,与今日练习书法时采用的回字格、九宫格、米字格等“格临纸”,功用相同:按照原刻版式、文字尺寸制作出两套“套格纸”,即可将文字的间距和笔画的位置定位,“对临”出与原刻一般大小的复制品,即使缩放也不在话下。

当然,对临法毕竟不是照相,达不到“纤毫毕现”的仿真程度。操作者临摹文字时会一气呵成,在大致保持原刻字形的情况下,也留下自己特有的书写笔迹。这在《刊印考》对影刻本《梅花喜神谱》的考证中也有论述:翻刻本对比原书字形,“其实是有一点走形的。袁廷枬没有亦步亦趋,既在间架上尽力保留原书版刻的特征,又在笔划的起承转合处带上了自己的用笔习惯。所以我们甚至会觉得,古倪园本比景定本更自然而不像翻刻本”。我们拿几部影宋刻本与原书进行对照,即可发现都存在上述现象,只不过差异的程度不同而已。

影刻本有时会将原刻的藏书印予以保留,也会刻上自己的相关印章。但因技术上的原因,印章与叶面上的文字和栏线是不能相交的,否则会与文字或栏线相互遮挡。为此有两种处理方法,一是移动原刻印章的位置,二是去掉局部相交的栏线。著名藏书家周叔弢先生还发明了印文镂空法。上

个世纪20年代弢翁影刻《寒山子诗》时,序言首叶钤有“乾隆御览之宝”墨印,印文笔画较粗且与框线及框内四字相交,遮掩字迹。按照以往影刻古籍惯例,需变更印章位置;弢翁则另辟蹊径,将与框线和文字相交部分印文双钩镂空,既避免了干扰文字,又美观大方(图3)。

除了标明影宋刻本的版本以外,还有一类“仿宋刻本”,也是采用对临法翻刻的,效果不比影刻的差。此类书甚多,这里仅举一例,清嘉庆九年孙氏五松书屋和清光绪元年洪氏仿刻的《说文解字》。二者仿刻的祖本均为国图藏宋刻元修本,光绪本又转刻于嘉庆本(图4)。

影抄本

以往论者对影抄本的定义是:依据某本,覆纸影摹其图文及版式而成,又称影写本。这种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除了覆纸抄写极易损毁原书、效率很低等原因外,我还复核了一批明清时期的影宋写本,发现写本纸张较厚,覆在书叶上根本看不清纸下的字迹,如何摹写?例如国图藏明影宋写本《唐书直笔》《新唐书纠谬》,清初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班马字类补遗》《鲍氏集》,清道光四年黄氏士礼居影宋抄本《碧云集》,清初影宋抄本《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等等,数量众多,不一而足。实际考察的结果是,影抄本更多的是采用对临法摹写而成。

影抄本相对于影刻本来说,少了刻版和刷印两道工序,成书的难度小了不少,因此数量比影刻本多得多。影抄本的仿真度不如影刻本,因刻版自有其特殊的雕凿痕迹,与书写的笔迹是有区别的。总体上看,影抄本的笔画比原刻本纤细,棱角不明显,笔锋较为犀利。并且,影抄本由于工艺相对简单,成书较易,不免随意性大增,如清影宋抄本《东家杂记》(图5)不仅字形与原刻相差悬殊,甚至还恣意更改文字和行款,宋本卷上第一叶第二行“右朝议大夫”,影抄本变更为“左朝议大夫”,而且第二、三行的字数也发生了变化。有些虽保留了原刻的行款版式,字体字形却独树一帜,与原书相差甚远,例如清影元抄本《国朝名臣事略》(图6)等书便是如此。这还能算作影抄本吗?但有关古籍目录就是如此著录的。而且目前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来界定影刻或影抄本与原刻的相似度。大概行款不错,文字内容照旧即可。即以明末著名藏书家、出版家毛晋为例,曾影抄宋版书数十部,对质量要求极高,但晚年遭遇战乱,抄书高手难觅,影抄残宋本《杜工部集》时,只得“苍头”刘臣操笔为之。后毛晋将此影写本《杜集》授予其子毛扆曰:“其笔虽不工,然从宋本抄出者。今世行《杜集》不可以计数,要必以此本为祖也,汝其识之。”毛晋以为,影抄之“不工”并不影响其“从宋本抄出者”的价值。此例也从侧面证明,影抄本并非覆纸摹写,而是依靠手写模仿原本抄写的,而写手的水平有“工”与“不工”之分。

《自庄严堪善本书目》中有一部《刘宾客文集》(图7)三十卷,冀淑英先生著录为“明范氏卧云山房照宋抄本”。该文集估计只保留了版式行款和文字内容,并未模仿原刻的字形。说其“照抄”比较贴切,但例证较少,恐难以推广。明代早期的影抄本常见无格白底的,但文字字形的仿真度很高,略具刻本之风貌,如明影宋抄本《龙龕手鑑》《唐书直笔》《新唐书纠谬》等。其实无论照抄,还是对临影抄,只要按照原书的行款抄写,就不容易出错,故不少明清抄宋刻之本虽未注明影宋,亦实为影宋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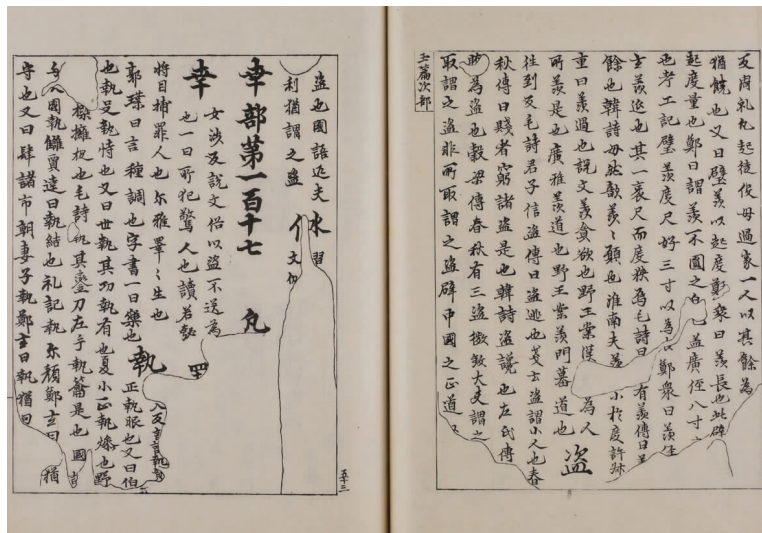


图1《古逸丛书玉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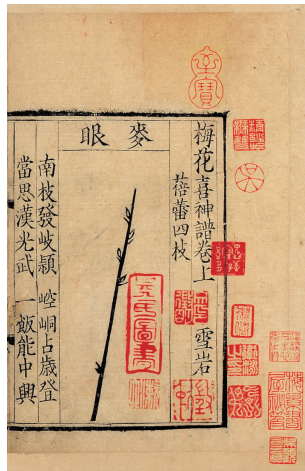


图2宋刻本《梅花喜神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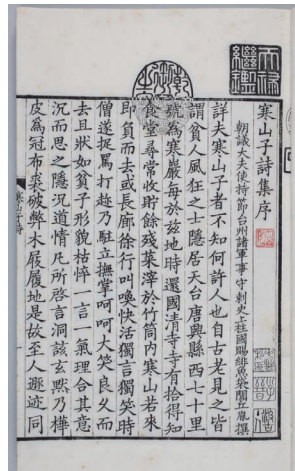


图3弢翁影刻之《寒山子诗》书影墨印双钩镂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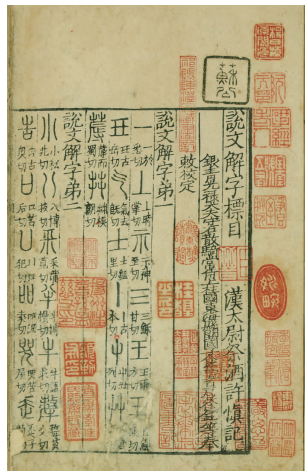


图4宋刻元修本《说文解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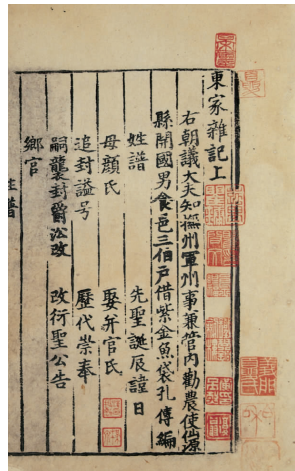


图5宋刻递修本《东家杂记》



图6宋刻本《国朝名臣事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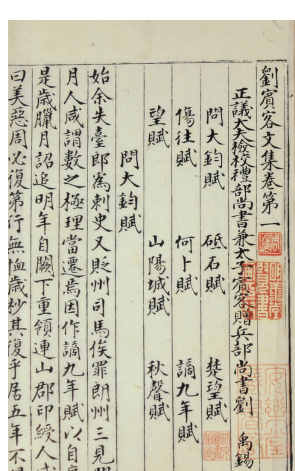


图7明范氏卧云山房照宋抄本《刘宾客文集》